

铃木正三“职分”思想在日本 资本主义萌芽期的历史作用

朱坤容

(北京大学 哲学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江户时代是日本资本主义的萌芽期, 在这个时期, 除了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以及“割据性”的封建幕藩体制的双重影响外, 佛教思想对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佛教思想中的“方便权智”观念不但在佛教的世俗化过程中具有极其显著的现实功能, 而且对资本主义萌芽期的发展也具有积极作用。日本僧人铃木正三的“任何职业皆为佛行”的职分论思想是其表现之一。“职分”思想为江户末期商人的经济行为重新进行身份诠释提供了理据, 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期的发展。

关键词: 铃木正三; “职分”思想; “职业皆为佛行”; 日本资本主义精神

中图分类号: B31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08)01-0030-05

一、引论: 问题意识、研究史及相关理论

在现代化的视域下, 资本主义除了是一种经济运营方式之外, 它还包含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表征, 所以对于其产生不能只从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方式的变化上予以分析, 还应该从政治、文化、思想体系等“上层建筑”的视角来进行考察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以社会学视角开资本主义动力研究之新端, 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的《德川宗教: 现代日本的文化起源》和山本七平的《日本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在其影响下^[1]研究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精神动力的代表性著作。贝拉在其书中提到的“日本宗教”包括佛教、儒教和神道教, 但其主要讨论的是儒教思想的作用, 其重心仍然是放在中华文明圈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儒教”上;^[1]山本七平则着重从日本纯粹的自身文化要素中寻找促进日本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力量。此外, 中村元认为日本资本主义的精神基础, 是由日本化的儒学和心学以及带有浓厚土著色彩的思想构成。^[2]

刘金才在《町人伦理思想研究——日本近代化动因新论》一书中, 从伦理思想史的角度对町人这一群体进行了考察, 指出“在佛教宗派中, 对町人伦理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的当推净土真宗”。^{[3](P46)}但有关内在于佛教世俗化中的教义——“方便权智”思想的作用和意义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揭示, 所以佛教思想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作用尚有待新的补充。本文试图从日本僧人铃木正三的“职业皆佛行”的思想出发来考察佛教从义理上对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所具有的影响, 以期在为资本主义这一宏大叙事提供一个个案的同时, 对佛教在东亚历史上的意义做一补充。

本文的理论基础主要是: (一), 资本主义的本质首先或者说主要是为已的个体理念。^[4] (二), 资本主义必须有一个阶层作为其保障或基础, 而且这个阶层必须是被社会以某种形式承认的一类固定的群体现象。 (三), 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行为而非道德选择。 (四), 宗教文化等思想因素将对整个社会新图景的构成具有指导性作用。^[5]前两点在文中着重予以展开的是日本社会

收稿日期: 2007-09-08

作者简介: 朱坤容(1978-), 女, 江苏泰州人,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 研究方向为中国佛教与东亚哲学。

① 贝拉指出: “问题在于日本的宗教中是否存在与新教伦理相类似的功能。”参看《德川宗教: 现代日本的文化起源》第3页; 山本七平指出该著作的主题是“探索经济领域里的‘无形的原则’”。参看《日本资本主义精神》, 第6页, 以及该书“译者的话”。

政治中的“割据性”(封建等级下的四民制度)为资本主义无意识提供了发展空间;后两点旨在阐明资本主义作为经济运营方式来说,它只是一种职业,其参与了社会构建,属于社会分工范畴,所以其本身不具备价值判断。

二、铃木“职分”思想对萌芽期内资本主义发展产生影响的现实基础:流通与割据

铃木正三的“任何职业皆佛行”的“职分”思想之所以能对萌芽期的日本资本主义产生影响是有相应的现实基础的,江户时代是日本资本主义的萌芽期,流通和割据可谓当时的社会政治图景之典型。

首先在经济基础上,日本江户时代的市场经济已经有所发展,流通这一特征并非新鲜事物。依照布罗代尔的市场经济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尽管资本主义在当时的日本尚未产生,但市场在近世日本逐渐形成且日趋扩大,比如江户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期货市场,^{[6](P25)}同时商品经济也在蓬勃发展。虽然幕府末期资本主义的显著成长本身就是同海外进行贸易所产生的结果^[7],但是在日本国内,由于其本身制度的特点促使城市和市场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藩阀林立的情况下,一些强藩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地,开展“藩营”事业,积累资本,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增长。参勤交代制度在这个过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流通促使了资本的发展。

其次在上层建筑中,封建幕藩体制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制度保障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割据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思想体系中的四民分治的身份割据。日本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至深,士农工商的四民等级制度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以庄园制为基础的幕藩体制可以说是等级森严的封建体制。刘金才提出这一政策限制了阶层间的流动,他认为“实际上等于给予了町人专事工商业的特权和经济上自由发展的空间”^{[3](P42)},但本文认为这一政策的限制对商人(当时也称町人)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是使得他们在这个体制内找到了自身发展的途径。这一方面体现在他们运用通货增强了自己的经济地位:“江户时代财政体制的基础是年贡米,……米不仅可以用来转帐,实际上还被运往全国各地”^{[6](P23)}这样,米就起到了相当于通用货币

的职能,这对于商人阶级无疑是有利的。事实上,“被视为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游民’和‘浮蠹’,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商人积累起来的货币资本,或用于以高利贷给领主和武士,或用于开发新田,或用于经营手工业,从而使其财力大大增强。”^[8]另一方面,商人也注重提升自己的政治权力,他们始终是在体制内作自身命运的改变,而并没有充分认可自身行业的价值所在,自身也并没有抗拒轻商的思潮,所以一些商人在发家之后,纷纷捐一个官职,或者和贵族、武士建立某种姻亲关系来提高地位。可以说,四民制度虽然遭到冲击但仍然具有政治效力。同时,虽然金钱或者资本在不自觉地向商人方向流动和集中,武士乃至贵族和商人之间的牢固的社会基石在暗暗地发生变动,但总的来说,商人阶级要改变社会的轻商主流思潮仍然面临巨大的阻力。这种长期贬斥商人牟利的思潮被布罗代尔认为是中国虽然有市场但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9](P355)}。

二是地方上诸侯各自相对独立的地域割据。除了分权的便利性^{[3](P43)}外,江户时代之前的战国时代已经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各地诸侯忙于混战,中央政权式微,对资本主义萌发也难说有强有力的控制,加上诸侯征战所必要的税收供应还需要商人的参与,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说是无意识的。当时的社会思潮也是如此:虽然鄙视商人但并不限制商人阶层自身的商业行为。包括当时的幕府,“可以说幕府根本就没有能够称之为政策方针的明确的经济思想,时而限制,干预民间贸易,时而又允许自由买卖和经商。”^{[6](P25)}这一点反而使他们获得了经济活动的空间。这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对职业人来说反而可以安心在本行业内做出应有的贡献。甚至有学者指出,政治上的割据和城市的繁荣使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堪比欧洲^{[9](P358)}因为封建性,布罗代尔将日本与西欧纳入同一进程,认为“其发展进程与欧洲大体一致:封建社会日渐侵蚀,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脱胎而出。……西方社会和日本社会是比较社会史上几乎自动由封建秩序转入金钱秩序的唯一例子。”^{[4](P48)}总之,日本被认为是在资本主义的蔓延过程中的特例之一,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封建性。

总的来说,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流通)和封

建制度的“割据性”使得经济活动的主体——商人有一定自由但也有诸多限制。可以说,此时的日本,“资本”在逐步地形成,但作为一种自由机体的“资本主义”还是处于缓慢的生长期。虽然商人的经济实力和地位在不断提高,但在政治和思想上仍然处于下位。这里,冲破后者的藩篱对商人的积极性乃至商业活动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虽然不能短时期内从政治上明确地对商人及其活动支持鼓励,但从观念上给商人及商业进行正名,这在精神上具有深远的解放意义。铃木的职分思想就是此时期的产物,其产生的作用是可以想见的。

三、铃木正三“任何职业皆为佛行”的“职分”思想及其作用

“方便权智”思想是佛教思想传播和教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特色,它在佛教的世俗化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里想要论述的是其在日本资本主义萌芽期对人们世俗思想的革命性作用。

随着商人经济地位的上升,传统的四民观念所遭受的冲击也越来越强烈,这时终于出现了一位积极为处于四民底层的商人正名的人。这个人就是江户时期的僧人铃木正三(1579—1655)。铃木正三又称石平道人,为禅宗僧人。根据其弟子所作的《石平道人四相》记载,铃木自幼对生死的问题就产生了疑惑。四岁的时候从弟死时,他对死后往何处去、死是什么等问题产生了思考。这一点也为他后来投身佛门种下了因缘。他曾是德川家康的武士,后来做朝廷的行政官员,食朝廷俸禄,在体察了人间世俗的悲喜之后,四十二岁那年出家,最后终于在“61岁时明心见性,觉悟本心”。铃木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任何职业皆为佛行”的职业伦理观,这一思想实质上是用佛教理论来论证世俗生活的价值意义。在这方面的代表著作主要是《三宝德用》《四民日用》,后结集为《万民德用》,后者被其弟子誉为“师之第一法典”、“师之第一书也”。

《四民日用》的“四民”指的是武士、农人、职人(匠人)和商人,《三宝德用》的“三宝”指的是世间的佛法僧,以上构成万民。另外,在《反故集》中的“四问四答”篇里,铃木以四民与僧人之间问答的形式阐释了他的观点。其中,他不只一次提出了职业皆佛行,修行皆佛行的理论。综合其著作

来看,可以将其观点分为以下几点:

1 什么是佛法?佛法具有积极的人生意义和社会意义。铃木认为,向善、正直、坚定和利他即为佛法。“夫佛法,除灭人类恶心之法也”(修业之念愿)。“佛法也好世法也好,都是正理行义,实践正直之道”(《武士日用》)。“佛之本意,万法伴万行,以勇猛坚固之心所成之意”(《石平道人四相》)。“佛之大法,是利益普天世间,安定国家,并且帮助诸道众生的妙法,这就是所言的三宝的德用。”(《石平道人四相》)

2 什么是佛行?只要是信心坚固,利益众生的修行就是佛行。“农业则佛行,意得恶时为贱业,信心坚固时为菩萨行”,所以“供养三宝,祭祀神明,操持世间之事,唯是农夫之德行”(《农人日用》)。为实现国中自由而进行买卖行为的商人,是顺应天道而得利,这种得利是允许的。而且只要是正直的人,即便是谋利的商人,也会诸天围绕,佛陀神明加护,消除灾难,万事都能合所其愿(《商人日用》)。原因在于这个商人是出于利他原则而经商。铃木举例说,如果一个人以行无漏善的愿力,增强坚守幻化之理的信心“为了世界而牺牲自身,一心一意地为了国土万民,把本邦的货物销往他国,或把他国的货物运到我邦,入渡远国万里,穷乡僻壤不辞劳苦,奔波于各个国家经商,怀着让诸人之心如愿的誓愿,决心克服万般困难,越万山穷其身,渡万河而清其心。船在漫漫大海上漂浮的时候,忘我念佛,领悟到人生只是浮世之旅从而舍弃一切执着。这样离欲的商人,诸佛会佑其成功,神明会施与大利,他也会经营日善,德行益美。”(《商人日用》)

3 如何修佛行,得佛法?只要是为世界而作的修行即是佛法,即佛法可通过世法来得以贯彻实施。“世法则佛法”、“佛法不异于世间法”(“修业之念愿”),“佛法世法同一”(《武士日用》),铃木先从宗教意义上肯定了职业的必要性,然后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指出了职业的价值所在。“任何事业皆佛行,没有佛行之外的行为”(《职人日用》)、“任何职业皆为佛行,从各守其业即可成佛,而佛行之外并无成佛之道,必信所事之业于世界有所益”,“世无铁匠以下诸工匠,则其无诸品可用;世无武士,则无以治国;世无农人,则无粟谷充饥;世无商人,则无货物流通。此外尚有诸多职业,亦皆于世界有所益”,“唯此乃佛之德用

也,人人当如此而求其弥可珍贵之佛。”(《职人日用》)

综合起来看,铃木将任何职业都看作是佛教中的修行,都是得道的途径,其中蕴含的奥义就是佛教中所说的“方便权智”,这尤其体现其在论证商人牟利行为的合理性中。“方便”思想是佛教的一个重要观念,简言之,“随方因便,以利导人”,方就是指方法,便指便宜,也就是善巧。两者合起来意思是,通过某种巧妙方法或手段来获得一种证悟。关于这一概念,在佛教经论上常被提起。释迦牟尼根据众生的根器利钝来讲述不同的经典,因材施教,即是方便的一种演示。通过方便所达到的被称为“权智”。虽然权智只是一种暂得的智慧,佛教的最上智是一种“实智”,但是通过“权智”,人能最终到达“实智”。所以,“方便权略,皆是弄引,为真实作门”。方便的目的就是帮助和引导人们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修行,最后殊途同归,证得菩提。

作为佛教中一种智慧生长之方法,佛的因机说教,一方面指出了个体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也暗示了殊途同归的可能性。同样,铃木通过强调职业皆佛行,“世法皆佛法”,将世间万物纳入佛教世界中来,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在暗含每个个体只要坚持修行本分最后都能到达同样的佛地。纵观其以上的观点,即商人平等、商业合理。为何如此说?可以从铃木思想中内在的个体存在的价值和合理利益的价值来予以说明。(1)个体存在的价值。佛教中的人人皆有佛性是普度众生,使其成佛得道的依据——个体的存在可以实现自身同时也能成就他者;在铃木的职分论中具有同样的逻辑。从《万民德用》的书名来看,万民也就是所有阶层的民,商人既然参与构建社会,成为社会和国家的建构者,那也就是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商业作为众多行业中的一种,也只是见道证悟的修行方法之一。所以每个人只是“职”(行业)不同,但“分”(修行及其目标——见性成佛)没有差别。另外,此书由《三宝德用》和《四民日用》组成,在将三宝与俗界进行分离的同时,他强调了作为四民之一的商人和其他三民一样的“日用”,肯定了四民在“用”上的平等性。进一步说来,士农工商具备不同的社会运转职能,在建构社会的意义上具有等同性,类同于佛教的修行、佛行。(2)合理利益的价值。从铃木对佛法

的世间积极性(“利益普天世间,安定国家”)和因地因时经商的“离欲”商人的肯定来看,他认同在一定条件下商人“经营”对社会机体运行的意义,“德用”一词即可见一斑。另外,铃木还规定了在一定条件下商人买卖的合理性。比如,商人“守正直之旨而事实买卖之业,如同随火焰上升,顺水流而下,天恩必降其身,万事必遂其愿”,^[10]强调了商人只要不违正直之宗旨,其经济活动是合理的。这对于长期处于封建伦理意识底层的商人来说,无疑是耳目一新、振奋人心之教。由此观之,“任何职业皆为佛行”和“万民德用”的思想正是“方便权智”思想的世俗应用。

铃木的这一思想在日本资本主义的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日本学术界,学者对铃木的革新理念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中村元认为他是日本“中世教界的革新者”^{[10](P335)},指出“把非僧非俗的立场贯彻到底,提出以俗贯通的最初的人,是铃木正三。他认为,每个人从事自己的职业,离开私欲执着而生活,就是真正的佛道修行”,这一点“可与西方法国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思想相比。”^[2]山本七平更是将之誉为“日本资本主义的缔造者”。^[11]中村元感慨“在西方,宗教由此曾对资本主义发生促进作用,而在日本还没有达到这一步。”^[10]但事实上,铃木的“职分”思想就已经用佛教的思想来解读世俗的行为,并且为商人的经济行为辩护,使得商人的经济活动更加名正言顺。后世有很多儒家的商业伦理,但铃木从佛教来正名商业伦理可谓独树一帜,颇具智慧。

回过头来看一下韦伯的职业观,他认为,“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正是这一点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首先提出了职业的思想。”^{[5](P34)}可见,职业的宗教意义在于能够履行世俗的责任,人们通过职业为得道的途径和方法,所以,“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5](P34)}在日本佛教中,铃木正是主张通过履行世俗义务来达到其“明心见性”之佛地。总之,铃木和韦伯都指出了职业是通往终极目标的“权”,而并非是终极目标的“实”,真正的“实”需要我们实践现世的佛行和

履行自身的责任来求得,两者可谓殊途同归。

四、结论

日本社会的发展深受中华文明影响,但其在接受外来文明时,注重和自身的本土文化相融合,逐渐形成自身特色,日本的政治制度也好,日本佛教也好,都是其中的范例。在日本资本主义的萌芽及其发展过程中,铃木正三的“职分”思想作为“方便权智”思想的一个运用典范,对江户时代这样一个儒家文化圈中的社会思想体系造成了小小的颠覆,虽然没有形成新的秩序,但职分平等、“任何职业皆佛行”的思想可谓已见日本近现代商人敬业精神之端倪。从这个角度而言,佛教“方便权智”方法论意义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应该留有一席之地。当然,佛教思想不仅仅在日本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具有推动和促进作用,而且在以明治维新为开端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它同样作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精神力量继续发挥着作用。

参考文献:

[1][美] 罗伯特·贝拉. 德川宗教: 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 [M] / “中文版序言”以及“平装版前言”, 王晓山、戴茸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P17

[2][日] 中村元. 日本佛教的特点 [M] / 中日佛教

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3] 刘金才. 町人伦理思想研究——日本近代化动因新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4][法] 布罗代尔. 资本主义的动力 [M]. 杨起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5][德]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M] 于晓、陈维纲等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6][日] 大野健. 从江户到平成——解密日本经济发展之路 [M]. 臧馨、臧新远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6

[7][日] 西光速, 大岛清, 加藤俊彦, 大内力合. 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 [M] 闫静先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P10

[8] 周启乾. 日本近现代经济简史 [M]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6 P15

[9][美] 乔万尼·阿里吉, [日] 滨下武志, [美] 马克·塞尔登. 东亚的复兴——以 500 年、150 年和 50 年为角度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10][日] 铃木铁心. 铃木正三道人全集 [M] 东京: 山喜房佛书林, 1988

[11][日] 山本七平. 日本资本主义精神 [M] 莽景石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1995, P 109

[责任编辑 张克军]

Shozo Suzuki's Idea of Profession Its Historical Function
in the Embryonic Stage of Japan's Capitalism

Zhu Kunr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Edo Period witnesses the embryonic stage of Japan's capitalism, when Japan's capitalist spirit is influenced not only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separatist shogunate system, but also by Buddhism. The concept of "enlightenment by wisdom" in Buddhism plays an active part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dimentary capitalism, as well as a pragmatic role in the secularized process of Buddhism. Japanese Monk Shozo Suzuki's idea of "any profession for Buddhism" produces extensive effect on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philosophy and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businessmen's economic behavior and their status roles so as to promote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is historical period.

Key words Shozo Suzuki idea of profession "any profession for Buddhism", Japan's capitalist spirit